

# “中国模式”的中国话语

陶绍兴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2)

**摘要:** 中西方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呈现出日益政治化的态势,这是西方话语分析范式的必然结果。“中国模式”是自我授权的。中国不应简单地复制西方话语,而是探求一种源于自身历史与中国智慧的方法,开拓出“中国模式”理论的新天地。用中国话语表述“中国模式”,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语境不可或缺。臻于成熟的汉语使得建构“中国模式”话语体系成为可能。

**关键词:** “中国模式”;现代性;话语变迁;理论建构

中图分类号: D 02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3)03-0034-08

## On Chinese Discourse of “Chinese Mode”

TAO Shao-xing

(Anhui Business College of Vocational Technology, Wuhu 241002,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argument about what the “Chinese mode” is becomes an increasingly politicized trend, which is inevitably derived from the Western discourse analysis paradigm. Granted that the Chinese mode is of self-empowerment, it is no doubt that rather than copying simply the Western discourse, China should explore an approach to open up a new theoretical realm of the Chinese mode according to its own history and wisdom. It is indispensable for us to apply Marxist academic context into the definition of the Chinese mode by means of Chinese discourse. Attaining good Chinese language makes it possible to construct the thought of Chinese mode.

**Key words:** *Chinese mode; modernity; discourse changing;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增强“中国模式”的感召力、吸引力,必须要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李长春同志指出:“如何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

畴、新表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是理论界和学术界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sup>[1]</sup>。正在形成的“中国模式”的话语与关于“中国模式”的思想的互动,帮助加强了中国的现状。

收稿日期:2012-04-27

作者简介:陶绍兴(1976-),男,安徽芜湖人,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政法部讲师,哲学硕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一、言说中国的艰涩之旅：“中国模式”的话语变迁

从现代性的视阈考量，“中国模式”乃为既有之物。现在，尤为迫切的是，要真正厘清“中国模式”的历史轨迹，了解“中国模式”的话语变迁，藉以增强中国话语的正能量。

### 1. 历史的实存：现代性视阈下的“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学术主题，而确定“中国模式”的历史渊源是讨论“中国模式”的前提。关于“中国模式”的发端，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滥觞于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之后，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源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来，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发轫于建国以来，也有的学者认为考量“中国模式”要有大历史观视野，故而“中国模式”应溯源至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

为此，先要对“中国模式”予以定位。“中国模式”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分界线，更是传统与现代的界碑。在整个农业文明阶段，中国的硬实力及在其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软实力都一直居于世界前列，中国长时间处于世界文明的中心。作为中国伟大复兴之路的探索——工业文明阶段的“中国模式”，是以现代性为导向的模式，应定位为现代性的模式。“中国模式”承载着中国现代化的理论诉求，是对世界现代化的积极回应。当前，所讨论的“中国模式”的问题就是中国如何实现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及构建的问题，所以“中国模式”的时间起点应该放在鸦片战争之后。如果说“中国模式”起源于改革开放之后，那只能表明“中国模式”只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模式。简言之，“中国模式”乃是一个历史的实存，只是由于近三十几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才引起了全球瞩目。

从地域上看，“中国模式”的主要参照系是欧美现代性的模式。中国现代性的模式异质于欧美殖民现代性的模式的地方，在于“中国模式”是内生性的模式，是和平崛起的模式。因此，应平和、理性地对待“中国模式”，就是说既不能妄自

菲薄，毕竟“中国模式”代表了对世界现代化的一种探索；也不可妄自尊大，“中国模式”也只是代表了世界现代化的各种版本中的一种。

### 2. 现代性的探索谱系：“中国模式”话语的嬗变

中国现代性的探索谱系先后历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苏联模式及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粗线条的历史轨迹还是清晰可辨的，依序为以民族解放和社会革命对抗殖民，以群众路线动员参与对抗苏式官僚国家主义，再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抗资本主义整合。期间变革的断裂、现象的混杂都不曾掩盖历史的连续，从‘中国模式’继往开来的角度，可以说它一以贯之”。

(1)救亡图存的颤音：殖民话语。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成了典型的世界各种殖民话语的试验场。面对“亡国灭种”的绝境、做“东亚病夫”的耻辱，为了救亡图存，林则徐呼吁国人要“睁眼看世界”，洋务运动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甲午战争的惨败，慈禧政权提出了“清末新政”，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措施，诸如“振兴商务，奖励实业”、“废除科举，育才兴学”，以期扶大厦之将倾，但为时已晚。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提出既要发展资本又要节制资本，既要引进民主政治又要发展民生经济，仍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憾。正如国歌所唱的那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2)“最后的吼声”：革命的话语。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国人民开始“以俄为师”，引进了苏联革命话语。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但不加分析教条化地引进马克思列宁主义话语，固守本本主义也使中国革命出现了一些反复甚至挫折。“城市中心论”的话语几乎让中国革命毁为一旦，因此，必须要创造性地建构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话语。为了能使马克思主义能够更好地指导中国的革命的实践，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说中国话的问题，进而提出了“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与党的革命路线相适应的中国话语体系。毛泽东创造性地概括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话语。他在国内革命战争间隙,撰写了《矛盾论》和《实践论》等著作,开拓了马克思主义话语指导下的“中国模式”话语空间。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sup>[2]</sup>。这是中国革命话语模式的雏形。在1942年2月8日的延安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再次强调:“必须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提出了“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与我国革命话语相适应的革命话语<sup>[3]</sup>。“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就倾向于用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观点,而不是用传统的左派和右派的观点来看待世界”<sup>[4]259</sup>。

中国革命的话语呈现出了这样的一些特点:第一,革命的话语都是以意识形态为中心,“意识形态要引导政党甚至社会的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人用意识形态来指导现实政策,如果现实政策和意识形态不相符合,就要改变现实政策,迎合意识形态的纯洁性”。“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独特的话语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下产生的。美国学者弗兰兹·舒曼(Franz Schurmann)说,“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性斗争登上权力地位,创造了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不论伟大的人物还是平庸之辈,都在用组织化了的政治权力达到不同的目的,演出人类的戏剧。他们在重建一个伟大的国家,约束着她的人民,改善着人民的生活,打下了增长的基础。共产党中国犹如一栋由不同的砖石砌成的大楼,她被糅合在一起,站立着,而把她糅合在一起的就是意识形态和组织”。第二,注重革命话语的输出,对亚非拉国家的革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时的越南、古巴、柬埔寨、菲律宾等国家的革命都有中国革命的影子。第三,中国的反殖、反帝、反霸的话语在国际上较为有分量。“三个世界”论、不结盟理论的提出,就连西方的报纸杂志也竞相转载,其影响经久不衰。即使是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浩劫,也受到了阿尔都塞等

西方学者的热捧,因为“毛主义包含着对勤俭节约的清教徒式的道德说教和对公共利益的奉献,而这些恰好就是卢梭所感怀的”<sup>[4]260</sup>。第四,意识到了话语也是一种权利。在《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中,毛泽东非常精彩地论述道,“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的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问题”。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所奠定的革命话语,“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毛泽东对中国的建设话语也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sup>[5]</sup>。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完成革命的话语向建设的话语的过渡。“我们革命有经验,在建设上我们的经验甚少。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懂得,只好搬”。痛定思痛之后,我们誓要找到中国建设的话语。

(3)“中国好声音”:建设的话语。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我们党成功实现了革命话语向建设话语的转型。改革开放伊始至南方谈话前夕,立足于中国的现实,邓小平特别强调:“应该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sup>[6]</sup>。“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等话语成了这一时期的主导话语,著名的“猫论”与“摸论”,中国老百姓都耳熟能详。这一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入了主流话语体系。“意识形态开始从‘进攻型’向‘防守型’发展”,“意识形态是为现实服务的,用来解释现实的合理性和论证现实政策的合理性。当意识形态与现实不相吻合时,需要修正的是意识形态,而非牺牲现实”。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经验的基础

上,提炼出了“中国模式”的建设话语。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sup>[7]</sup>。这里“准确的表述语言”指的是“中国模式”建设理论的学术话语,包括“社会主义三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

南方谈话之后至今,中国处于发展型阶段。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将“中国模式”的建设话语推向21世纪。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模式”的建设话语,科学发展观将发展型的“中国模式”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又开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国际化,即“中国模式”建设话语的国际化。

## 二、无根的浮萍:“中国模式”的“话语空转”之困

中国快速的腾飞令西方世界深感震惊,关注中国令人吃惊的崛起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共识。可是,由于话语根基不牢,新自由主义、西方左翼对于现代性的阐释成了无根的浮萍,他们关于“中国模式”的解读陷入“话语空转”之困境。

### 1. 话语膨胀之下的宏大叙事:被终结的“历史的终结”

20世纪80年代末,日裔美籍学者弗兰西斯·福山曾抛出了轰动一时的“历史终结论”。一厢情愿地认为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他断言,“如果我们现在还无法想象出一个完全不同于我们自己这个现实世界的世界,或者未来世界没有以一种明显的方式来体现对当今秩序的彻底改善,我们就应该承认历史本身已经走到了尽头”<sup>[8]</sup>。这种历史观是当时西方学界心理膨胀折射出话语膨胀的反映。2007年的美国的次贷危机和2009年中国经济的强劲复苏这一客观事实使福山感到,“中国模式”不应被

视为一个“幸运的例外”,而是一个“颠覆性的案例”,因为,“中国模式”成功挑战了西方的价值秩序。福山不得不反思他的宏大叙事,他改口道: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不是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的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要为中国留有一席之地,世界需要在多元基础上实现新的融合,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尽管福山有所保留地认为,对于很多国家来说,中国所代表的发展模式是非常难以复制的。因此,中国发展模式似乎并不可能成为一种普遍发展模式<sup>[9]</sup>。

“中国模式”无情地证伪了“历史终结论”。她所具有的世界意义和内在价值,已然是西方理论话语无法解释的。西方学者所鼓吹的新自由主义远不是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而恰恰正是问题之所在。这里的原因包括:一是由于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西方式的言说和“中国模式”的实际情况之间存在摩擦。二是中国的独特性也决定了构建“中国模式”必须要讲中国话。“实际上,中国的很多东西都是混合的,都在似与不似之间。这是中国很奇妙的地方,套用西方的概念不行,逼着我们要讲自己的话,讲中国特色的话”<sup>[10]</sup>。三是由于西方理念存在问题。如理性使人完善、程序万能和消费至上等理念在西方世界根深蒂固,而这些理念恰恰是西方现代性问题的致命病因。

### 2. “麦子对镰刀的反抗”:西方左翼的失语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传来了新自由主义将被埋葬的挽歌。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曾一度十分活跃。“占领华尔街”运动几乎成他们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思想资源。然而,西方左翼态度上的激烈掩饰不了立场上的保守,“占领华尔街”运动最终变形为“一场简单的嘉年华”。正如俞吾金所指出的,“我们发现,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无论是左翼理论家,还是参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积极分子,他们在思想上都是极端肤浅的。这里只有盲目的冲动和含混的激情,完全没有冷静的理论思考和思想上的真知灼见”<sup>[11]</sup>。左翼理论家们“不敢用自己的脑袋去触

碰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只是装出严肃的态度在理论上作秀而已。这就是他们在理论上的最后归宿”<sup>[11]</sup>。由是观之,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充其量只是上演了一场麦子反抗镰刀的闹剧,所以一俟闹剧收场,他们就失语了。

### 三、给思想一种语言:“中国模式”的理论建构

黑格尔深刻指出,“只有当一个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掌握了一门科学的时候,我们才能说这门科学属于这个民族”<sup>[12]</sup>。这一点,对于“中国模式”来说最有必要。中国不应简单地复制西方话语,而是探求一种源于自身历史与中国智慧的方法,开拓出“中国模式”理论的新天地。用中国话语表述“中国模式”,马克思主义学术语境不可或缺。“马克思的世界观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之外,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语言中都找到了拥护者”<sup>[13]212</sup>。臻于成熟的汉语使得建构“中国模式”话语体系成为可能。

#### 1. 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纵观历史,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勃兴;而文化的每一次跃迁,无不以思想的觉醒和理论的创新为引领”。“中国模式”欲走向澄明之境,必须增强理论自觉和提高理论自信,从对西方的学术依附中解放出来。把“中国模式”的发展优势转化为提升中国软实力的话语优势,实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化,不断增强“中国模式”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中国知识界作为意识形态的总管家,打造“中国模式”的话语体系责无旁贷。

首先,“中国模式”的建构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打造“中国模式”的话语体系,去意识形态化的做法不仅是错误的,更是危险的。如果说儒家文化支撑了中国农业时代的文明长期走在世界前列,那么,在工业文明时代中国欲继续引领世界,必须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语境。为了确保马克思主义不失语,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不可搁置。

其次,要特别当心西方话语隐含的预设,谨防陷入西方话语陷阱。“讨论任何问题,一定要跳出别人圈出来的框框,包括流行的概念、分析框架、理论体系。尤其是政治问题,在这个领域里流行的概念、分析框架、理论体系都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其隐形预设的结论”<sup>[14]</sup>。“中国威胁论”、“中国不确定论”就隐含着这样的话语预设:从政治上将现代国家二分为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民主国家之间不会有战争。而中国是专制国家,所以崛起的中国必然给世界带来威胁。

再者,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更需要传统知识分子的坚守。与其我们感叹大师渐远,不如多做一些扎扎实实的研究。研究“中国模式”,挟洋自重的学徒状态要不得,贾贵思想要不得,阿Q思想也要不得。中国的知识界必须抬起头来,自信、大胆地总结“中国模式”,敢于挑战西方话语独霸天下局面。我们的理论自信不是没有根据的,环顾全球,欧债危机继续蔓延,美国仍困顿于财政悬崖,伊斯兰国家正在经历转型的阵痛,惟独中国风景这边独好。

#### 2. 探索“中国模式”的成功之道

理论的逻辑与时代的逻辑向来都是并行不悖的。“中国模式”是在回应关键问题中推进的。研究“中国模式”必须恢复马克思一贯倡导的问题意识。“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正如一道代数方程式只要题目出得非常精确周密就能解出来一样,每个问题只要已成为现实的问题,就能得到答案。世界史本身,除了用新问题来回答和解决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sup>[15]</sup>。有没有“中国模式”,这是一个无须赘言的常识性的问题;“中国模式”是什么,这是中西学界都可以探讨的问题;“中国模式”为什么能成功,这是我们必须要应答的问题。

“中国模式”的成功,是马克思主义的成功,而不是新自由主义的成功。新自由主义话语是“学术言说”包裹下的偏见,要特别警惕。“自由

市场经济”加“一党专制”是新自由主义对“中国模式”的拙劣的阐释。中国的成功靠的不是对新自由主义的路径依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新自由主义的药方里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新自由主义的药方里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新自由主义的药方里也没有，所以说新自由主义不是包治百病的“莫里逊氏丸”，充其量只是一种拙劣的话语表演。如果中国的成功是新自由主义的成功，那就不存在“中国模式”一说了。

“中国模式”所经历的挫折是由于没有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表明，什么时候我们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我们的事业就能顺利发展；什么时候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我们的事业就会受挫。重新建构“中国模式”的话语体系并不是简单的话语转换，而要做到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在革命时期，“中国模式”的比较优势在于：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等三大法宝。在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包容发展、实践理性、民生为大是“中国模式”的比较优势之所在。我们还要探讨这些比较优势之间的内在机理，以掌握“中国模式”的特征，确立“中国模式”应有的地位。

### 3. “中国模式”的中国阐释

正是因为雷默第一个指认了“中国模式”乃是为了认识中国而搭建出的一种分析框架，所以他被视为“中国模式”概念的发起人。在提及“北京共识”出炉的背景时，雷默指出：“试图用清楚明了的语言描述我在中国看到的情况，并且为如何思考中国这样一个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变化的国家提供一种框架”<sup>[16]3</sup>。在一年之后的关于中国发展道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他再次强调：“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分析一种框架，但并不涉及具体内容，这种框架不具有感情色彩，仅是对快速发展和竞争中产生的问题起到有效的整顿作用”<sup>[17]7</sup>。他还对当时在西方世界比较流行的“中国威胁论”重新进行了解读，在他看来，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就是“中国模式”的分析框架成功挑战了“华盛顿共识”即新自由主义的

分析框架。“‘华盛顿共识’的基本原则在这里并不有效，在中国国内和国外都存在着对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误解，这样的原因是没有一个合适的智力或思维的框架来思考这件事，这里的变化实在是太快了。我研究这个领域是想要澄清关于因特网的框架无法适用于解释中国，中国有自己的模式”<sup>[17]9</sup>。“‘北京共识’就是讨论这样的一种结构框架，简言之就是思考我们今天居住的中国正在发生什么而设计一个思想框架”<sup>[17]10</sup>。当然，雷默提供的框架仍然是新自由主义的框架。

### 4. “中国模式”对外部境况的守护

“中国模式”的话语体系是与华盛顿体系话语博弈的结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化”犹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两者之间的互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竭动力。不应该将两者割裂开来。“长期以来，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里存在着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这两个重要的领域常常是在相互分离、相互割裂的状态下得到研究的”<sup>[18]</sup>。

在西方现代性殖民扩张中，“中国模式”话语体系曾被迫西化、英语化，中华文明一度被边缘化。中国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抱怨是有深刻根源的。“这个根源产生于全球权力的变化生成之中。与19、20世纪亚洲的反殖民运动中的防卫性的自我主张——抱怨自己是在诸文化宰制的帝国权力手下的受害者——有所不同，今日他们有更多的自信要在全球权力里寻求新的平衡，其中，昨日的受害者将在形塑现代性的决策中占有一席之地。换言之，要求去重新定义现代性的文化内涵”<sup>[19]</sup>。“中国模式”存在着一个解构和重新建构前现代性维度的内在理念，如和平发展理念、科学发展理念、包容性发展理念等。反思和拷问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充满了对外扩张和殖民运动，酿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冷战时期，全球上空笼罩着军备竞赛下的生存威胁阴影。后冷战时期物质至上理念造成的地球资源枯竭的现实危险。“中国模式”话题引起国际热议，表明西方世界对“中国模式”一

定程度的认可,也表明西方世界解读“中国奇迹之迷思”的理论冲动。然而,对于认识“中国模式”,太多的是以自我为中心,这决定了西方话语存在盲点。

“中国模式”拓展了现代化的路径,证明了人类文明发展是而且应该是多样性的。她的最大价值是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价值观。“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勾画出了“中国模式”的发展远景。“中国模式”是“中国梦”的载体。“中国模式”的实现之时,即是“中国梦”的圆梦之日。

#### 5. “中国模式”话语的转换

尽管“资本主义已经从神坛上跌落了下来”,但一味地拒斥西方话语,是不现实的。“在中国模式建构的过程中,西方话语输入已经深入机体,浸入骨髓,不仅很难从中剔除西方话语的影响,而且阻挠了西方话语的继续输入在某种程度上也就阻遏了中国模式的”。“西方话语伴随中国模式的继续发育将继续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此即中国模式继续发育的一个基本环境,也是中国模式继续发育的一个基本条件”<sup>[20]</sup>。因此,必须注重“中国模式”话语与世界话语的对接,批判地借鉴西方话语资源,实现中西文明之间的对话,为“中国模式”提供张力。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我们作了典范。首先是要夺取话语权,将反映人类文明成果的话语大胆地采取“拿来主义”,把这些话语写在“中国模式”的旗帜上,内化到我们的话语体系当中。“我们必须树立一个明确认识,不管是哪种社会制度下创造的文明成果,只要是进步的优秀的东西,都应积极学习和运用”。如“自由”、“平等”和“博爱”等政治话语权,它们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拒斥这些话语,恩格斯指出,“自由、平等和博爱。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地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社会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党的十八大的报告中,已经被“自由”、“平等”列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次,要旗帜鲜明地颠覆西方的话语霸权。有些话语如“人权高于主权”就

要果断地放弃,这一话语即使在西方世界也是声名狼藉,我们中的有些人却奉为圭臬。最后,批判地改造西方话语,为我所用。如我们将“北京共识”转化为“中国模式”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我们的考量是:一是因为“北京共识”是一个霸权性的语言,不利于中国的外交事业。二是共识用得太多、太滥,以致“耶鲁全球化”网站有篇文章讽刺道:“如果你想要你的思想非常有市场,那就贴上‘共识’的标签,这表明它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系统的理论”<sup>[13]</sup><sup>179</sup>。三是根本就没有形成什么共识。又如“软实力”一词,我们赋予了其全新的中国内涵。约瑟夫·奈最初提出软实力概念,其动机就是为美国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服务的,而我们用它则是为了建设和谐世界、和谐社会而服务的。

中国人民是“中国模式”实践者,对“中国模式”感同身受,他们最了解“中国模式”,因而也对“中国模式”最有发言权。应注重“中国模式”的学术话语向大众话语的转换。毛泽东曾明确要求:“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sup>[33]</sup>让“中国梦”梦想成真并与我们同行,这终将取决于中国人民自己。

## 四、不是结论的结语:“中国模式”再出发

模式不表示必须遵守的范式,中国无疑有着自己的模式。“中国模式”是中华民族现代性探索的第一位的问题,它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种必然选择,其实质就是中国现代性的重塑与建构。开启“中国模式”的话语历程,必须努力提高“中国模式”话语空间。

“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的生命。关于“中国模式”的话语研究还停留在“拿来主义”的阶段,视野还不够开阔,只是在强势的西方话语面前发出的微弱回声;尤其是在用马克思主义提炼“中国模式”话语体系方面,尚存在很大的开拓空间。

因此,用我们的话语来表述我们的模式,使“中国模式”的中国话语回归世界话语中心,中国的知识界责任重大。

尽管英语话语独霸局面在可见的未来不会

发生改变,但汉语崛起也是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让世界倾听“中国好声音”时不我待。伴随着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中国会再次回到世界舞台中央,引领世界,书写全球时代精神的谱系。

#### 参 考 文 献

- [1]李长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2-06-03.
-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44.
- [4](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M].李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 [5]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2-11-18(01).
-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1.
- [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1.
- [8](美)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59.
- [9]俞可平,福山.对话:全球化、当代世界和“中国模式”[N].北京日报,2011-03-28(02).
- [10]潘维,玛雅.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年与中国模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83.
- [11]俞吾金.西方左翼理论家并未突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评论为例[N].社会科学报,2013-01-03(3).
- [12]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187-188.
-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4]王绍光.理论自觉自信自强:路径与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理论研讨会[J].人民论坛,2012(8):6-10.
-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89.
- [16]雷默.北京共识[M]//黄平,崔之元.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 [17]俞可平.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 [18]程伟礼.从“中国道路”向“中国模式”演进[N].社会科学报,2012-11-01(01).
- [19](哥伦比亚)帕沙·查特吉.现代性的文化内涵有待重新定义[N].社会科学报,2012-12-21(06).
- [20]张师伟.西方话语输入与“中国模式”的建构:“中国模式”建构的话语背景[J].文史哲,2012(5):20-25.